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

亚洲的戏剧

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 著

04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211号

亚洲的戏剧

Yazhou De Xiju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 著

谭力文 张卫东 译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红庙)

北京怀柔燕东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125印张 283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ISBN7-333-0330-0/P·124

定价: 5.30元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问	厉以宁	宋承先	张培刚	胡代光
	钱荣堃	高鸿业	黄范章	谭崇台
主编	贾 湛	梁小民		
编委	于同申	厉以平	何宝玉	李玉臣
	吴珠华	吴衡康	杨仲伟	杨德明
	宋慧毅	邹 蓝	范恒山	冼国明
	俞品根	施 炜	顾 昕	舒 元
	薛进军	薛 捷		

编者献词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介绍了不少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对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使这种介绍更具有全面性和代表性，我们决定系统地翻译出版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的主要著作，作为翻译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本丛书从1988年开始陆续出版。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奖。它是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在其建立300周年时为纪念诺贝尔奖金提供者而设立的基金，全称是“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委任组成的“经济科学委员会”评定。从1969年起在每年的10月中旬与其他各项诺贝尔奖同时公布，到1987年为止已颁发19届，共有欧美的25位经济学家获奖。获奖的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基本上代表了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读者通过这些著作能全面、深入、系统地了解和研究西方经济学，从中吸取对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发展有价值的东西。

当代西方经济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数学方法的应用。经济学要反映经济中的数量关系，因此，经济学与数学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7世纪起经济学家就用数学公式来表述经济理论。本世纪以后经济学家又把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结合起来建立了经济计量学，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学的数学化是经济学精密化、实用化的标志。在获奖的经济学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在这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获得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挪威经济学家R·费瑞希和荷兰经

济学家J·丁伯根是经济计量学的创立者。以后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逊、K·阿罗、W·里泽惕夫、P·库普曼、L·克莱因、G·德布鲁、英国经济学家J·希克斯、苏联经济学家L·康托洛维奇都在经济学数学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流派林立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新古典综合派是公认的“主流派”。这一派继承并发展了凯恩斯主义，对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都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在获奖的经济学家中属于这一派的有相当比例，如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逊、L·克莱因、J·托宾、F·莫迪利亚尼、R·索洛，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70年代后西方经济政策与经济理论的显著变化是自由主义的影响日益增强。代表自由主义的奥地利经济学家F·哈耶克、美国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G·斯蒂格勒、J·布坎南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便反映了这种趋势。

经济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科学。因此，获奖者中还有一批对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如：美国经济学家S·库兹涅茨和英国经济学家R·斯通对国民收入统计作出开创性贡献；美国经济学家A·刘易斯和T·舒尔茨对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有独特贡献；瑞典经济学家B·奥林和英国经济学家J·束德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关系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经济学家H·西蒙对管理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本丛书的选编以获奖者的代表作，特别是在西方经济中影响重大的名著以及对我国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启发和借鉴的著作为主，每位获奖者的著作至少选一本，以保持其系统性与代表性。

还应该说明的是，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获奖的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学者，因而在这些著作中必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阅读时应注意这一点。但是，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之一，有其不可忽视的精华，资产阶级学者对经

济问题的研究有其可取之处。从这种意义上说，只要我们以分析的态度认真阅读这些著作，必将得到许多有益的收获。

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老一代学者与中青年学者的关心与帮助，谨向关心与帮助这套丛书编辑出版工作的所有朋友表示感谢。

编 委 会

1988年4月

前 言

甚至在1968年冈纳·缪尔达尔的不朽著作《亚洲的戏剧》出版以前，20世纪基金会就决定推出该书的简写本。在基金会自身的历史上曾有过采取此种步骤的先例，基金会经常发现，有意义的创造性研究需要广大的空间以学者和专家需要的形式展示各种发现。然而，要达到这个终极效果，一部著作也必须以较短的、更可读的形式提供给一般公众。这样，继琼·戈特曼的重要著作《大都市》（一部长达810页的书）之后就有一个只有128页的通俗版本问世，题为《大都市的挑战》。其他一些基金会的研究报告也以节录本出版了。

就《亚洲的戏剧》而言，另一个因素起着有力的作用。一部三卷本著作的成本一定将成为它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不发达国家发挥最有效作用的一个严重障碍，该书的宗旨就是要帮助这些国家。由于这些原因，20世纪基金会的受托人决定资助出版包括缪尔达尔教授透彻分析和建议核心的单行本。

显然，缩写一个几乎长达2300页、耗时长达10年的研究报告是个挑战性的非常艰巨的任务。嘉思·S·金，一位诚实而经验丰富的著作家，被证明是承担这一任务的理想选择。他不仅具有关于南亚的实际知识，而且对冈纳·缪尔达尔透彻地了解这一地区怀有巨大的钦佩之情。他试图抓住《亚洲的戏剧》的精髓，而不插进新鲜的个人的材料。由于他清楚地认识到缪尔达尔在评价许多与发展有关的因素——人口、政治、心理、社会传统——中所作的独特贡献，所以，他试图简略地复制出研究报告。他也意识到，尽管变化加速，缪尔达尔教授提出的根本思想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依然有效且符合时势。而且，他还有另一个有利条件——身

受缪尔达尔教授耳提面命之惠。

但是,没有严格的选择是不能达到简写目的的,这意味着要删略许多重要的细节并改变一些侧重点。金先生主要负责挑选应当删节的材料和怎样对保留部分作出最妥善的处理。他的《亚洲的戏剧》是单独完成而不是合作的产物,它自成一体。但它忠实于冈纳·缪尔达尔的信念:除非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进行研究,否则,不能理解经济发展。

尽管简写不能再现原著的全部内容,但我们感到,金先生已成功地保留了《亚洲的戏剧》中的许多独到的见解。它抓住了原著的大胆的非正统性及其对阻碍发展的条件的现实估价。对任何对经济发展前途感兴趣的人它都是开卷有益的。但是,我希望,金先生节录本的读者在叹服之余将进而查阅缪尔达尔教授整个研究报告。

就《亚洲的戏剧》中对南亚及世界的事件和发展的记录和评论而言,该研究截止于1966年1月1日。本书并不试图修改这一内容。即使基本事实以及事实之间的关系仍然未变,但已有一些新的重要发展——例如,农业中的“绿色革命”。冈纳·缪尔达尔最近的著作《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万神出版公司,纽约,1970),已经考虑到了这些新近的发展。

基金会感谢缪尔达尔教授拨冗审评金先生的著作。十分令人钦佩的是金先生的鉴别力、忠诚和辛劳。我相信,其结果将有助于更广泛地认识各国贫困的原因。

20世纪基金会董事

M. J. 罗森特

1971年5月

中译本序

被西方学术界誉为不朽之作的《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以下简称《亚洲的戏剧》），是由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经过10年的调查研究后写成的，于1968年出版。

缪尔达尔1898年出生于瑞典的索尔瓦勃。1927年获得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博士学位，以后，他陆续获得了30多个名誉学位。

缪尔达尔不仅在大学执教，还任过公职，并参加国际事务工作。他先后担任的职务有：1933—1939年斯德哥尔摩大学财政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1936—1938年和1943—1947年瑞典议会参议员；1943—1945年瑞典战后计划委员会主席；1945—1947年瑞典商务部长；1947—1957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1961—1965年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兼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1974年缪尔达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缪尔达尔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1953年秋，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作了为期6周的南亚旅行，广泛接触了巴基斯坦、印度、缅甸、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各阶层人士，深入了解了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以后他又多次访问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1957年秋，他辞去欧洲经济委员会的职务后，便全力以赴从事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终于写成《亚洲的戏剧》这一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它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好评。

《亚洲的戏剧》涉及南亚和东南亚地区11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约占全世界人口的1/4。缪尔达尔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

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这些国家贫困的原因和障碍发展的症结，除了大声呼吁发达国家应承担起帮助不发达国家取得发展这一责任外，他着重提出不发达国家自身必须进行三方面的改革：

1. 土地改革。各不发达国家的土地关系状况不尽相同，但有一致之处，即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关系严重妨碍了耕种者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从而不发达国家的农业产量一般是很低的，为此必须进行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关系的改革。

2. 教育改革。许多不发达国家教育的现实情况是：扫盲工作未好好开展，学龄儿童入学率不高，而中等教育比初等教育发展快，高等教育又比中等教育发展快，同时学生的学习目的是为了谋求一个坐办公室的工作，而不是到农村去，到落后地区去帮助贫苦人民。因此，必须进行教育改革，其内容是：广泛开展成人教育，优先发展初等教育；停办一些普通中学和高等学校，或改变其教育方向；发展技术培训和职业培训，以便培养更多的技师、农艺师、医生和教师。

3. 权力关系改革。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中，权力掌握在包括地主、实业家、银行家、大商人和代表他们利益的高级官吏的特权集团手里，这个集团考虑的主要是自身的发财致富而不是国家的发展。为此，必须进行权力关系的改革，把权力转移到人民大众的手里。

缪尔达尔不同意那种认为市场—价格机制的均衡力量可以自然而然地促进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观点，他认为应当看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结构上的差异或制度上的差异。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刚性、滞后、短缺、过剩往往成为不发达国家经济的普遍现象，因此，应当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结构性研究、或制度研究。如他所说：“制度研究不能依靠普通经济文献所使用的概念，或从发达国家的研究中借用诸如收入、储蓄、供给、需求和价格之类的概念，这些概念统统都在市场之内，统统以总量或平均形式而表现出来。这些概念不足以说明不发达国家

的现实。”^①基于同一理由，也产生对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如他所说：“为提高穷苦群众可悲的生活水平，需要的是激进的制度改革，这将为较高程度的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服务。这两个目标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这意味着与发达国家的根本区别，在发达国家，这两个目标可以而且经常分开来追求的。”^②

缪尔达尔认为，由于“循环和累积因果关系”的作用，经济增长过程将出现“回波效应”而促使不平等趋于扩大，因此，政府的政策干预是必要的。

在《亚洲的戏剧》中，缪尔达尔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前景似乎过分悲观，对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似乎过分贬低，在这两点上，招致了一些批评。但是，缪尔达尔对不发达国家发展过程如上所述的几点基本看法，是富有启发性的。

《亚洲的戏剧》在出版22年之后，现由谭力文、张卫东两同志合力译出，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在国内引起广泛的兴趣，必将有助于我们在深化改革中作出有益的思考。

谭崇台

1991年秋于珞珈山

①② 《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第156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目 录

第一部分：导论

第1章 我们自身的缺点	(3)
第2章 地区	(15)
第3章 价值前提与价值判定	(22)

第二部分：经济现实

第4章 初始条件的差别	(43)
第5章 人口和资源开发	(50)
第6章 国民产出与经济结构	(60)
第7章 生活水平与不平等	(69)
第8章 对外贸易与资本流动	(78)

第三部分：制订计划的第三世界

第9章 制订计划的思想的传播与影响	(93)
第10章 平等与民主	(104)
第11章 南亚的社会主义	(114)
第12章 民主计划	(120)
第13章 对私有部门的管理控制	(132)
第14章 腐败——原因和影响	(143)

第四部分：劳动力的使用

第15章 “失业”与“就业不足”	(153)
第16章 传统农业中的劳动力使用	(169)
第17章 农业政策	(183)
第18章 传统农业以外的劳动力使用	(205)
第19章 工业化问题	(214)
第20章 手工业和小型工业的状况	(226)

第21章 人口问题.....	(234)
第五部分：人口质量	
第22章 人力投资.....	(253)
第23章 保健.....	(263)
第24章 教育：遗产.....	(270)
第25章 识字与成人教育.....	(278)
第26章 学校体制.....	(285)
第27章 前提.....	(305)
译者后记	(323)

第一部分

导 论

第1章 我们自身的缺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年代里，世界的空间距离一直在缩短。在不到24小时内实际上就能到达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时，就几乎不剩下什么遥远的地方了。随着世界相对的缩小，产生了人们的一种新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世界人民命运的新的关注。这种关注特别转向世界富国和贫国之间的鸿沟上；鸿沟随着每一代人的延续而不断扩大。新的探索和研究浪潮已席卷了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

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许多资源现在正用于这些研究。浪潮正在高涨，我们经济学家正骑在浪尖上。战前，对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最深入细致研究是来自西方富国学术中心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通常在静态意义上向我们描述了这些国家的人民赖以生活、工作和生存的制度和处世哲学。对各种变化的分析通常从“动乱”的角度进行的。现在，经济学家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研究不发达、发展，以及拟定发展计划的动态问题。

我们在研究方向上的这一巨变并不是社会科学自动和自发的，而是巨大政治变化的结果。殖民列强结构已经迅速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不发达国家本身渴望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思考和行动的人渴望发展。最后，在冷战中达到高峰的国际紧张关系已使不发达国家的命运成为发达国家对外政策所关心的问题。

就西方国家，以及它们的学者与学术机构而言，显然这第三个原因是引起他们对不发达国家问题的兴趣的最重要原因。在不发达国家，本国的知识分子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而且偶尔引起冷嘲热讽的评论：西方和苏联之所以都乐意援助他们，而且更重

要的是对这些国家形势和问题很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世界关系的紧张。这种紧张关系使不发达国家的内部事务具有国际意义。

应该记住，南亚国家今天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与殖民列强体系瓦解之前并无很大不同。唯一的重要变化是近来人口增长率迅速提高。而在其人口迅猛增长之前，甚至在我们充分认识这人口问题之前，就已经爆发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的科学兴趣。总的来说，南亚的民众现在象战前岁月里一样穷，他们的生活象战前一样悲惨。

但是，他们的贫困和苦难并没有诱使经济学家对他们的境况产生任何大的兴趣，更不用说把注意力集中于怎样通过经济计划和协调的大规模国家干预以促进发展等各种问题了。遵循这种路线的实际行动就脱离了政治可行性的范畴。这种行动的迫切感也就更小了。

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对此毫无兴趣，显然是现有世界政治形势的反映。更明确地说，这种麻木不仁反映了殖民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受支配民族和对我们的影响。这些政权并不强调这些问题的政治重要性以引起人们对经济不发达的大规模研究。对社会科学家来说，在自我认识中尝试着弄清科学努力、特别是经济学努力的方向是怎样决定于我们生活的社会，更直接地决定于政治气候，这是使人耳目一新，而有益的锻炼。与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李斯特、马克思、约翰·穆勒、杰文斯和瓦尔拉、魏克赛尔以及凯恩斯的名字相联系的经济思想的重要重建都是对变化着的政治条件和机会的反应。

要得到更精致的社会科学研究图象，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变化了的世界政治形势是我们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不发达国家问题上来的原因。一旦我们承认了这种影响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问：它是否并不影响研究领域的选择和进行研究的方式呢？尽管这种研究领域的转移表明我们合理调整我们的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但我们一定在想它对我们研究工作中使用的方法的影